自由的写作?

——华裔美国作家哈金的悖论*

陈广兴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学研究院, 上海 200083)

摘要: 哈金宣称自己在追求一种自由的写作。然而其写作语言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编排, 都体现出一种无奈。这种无奈来自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必须讲述“真实故事”的困境。而哈金自己的言行也证明了自己迎合这种“真实性”要求所做的努力。

关键词: 哈金; 真实性; 《等待》; 《自由生活》

Abstract: Ha Jin claims to be pursuing some free writing, while his choice of English as the working language, characterization and plotting all embody the opposite. He as an ethnic writer has to tell “authentic stories” to enter American literary academia. Ha Jin testifies to his effor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authenticity by his interviews and behavior, too.

Key words: Ha Jin; authenticity; *Waiting*; *A Free Life*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101 (2009) 03-00880-10

哈金是当代最为美国文学界接受的一位有中国背景的作家。他用英文写作, 作品涉及的时间跨度基本上是中国大陆的文革前后。他的许多作品受到美国批评界的高度评价和推崇, 并斩获多项美国文学大奖。1996年以《辞海》(*Ocean of Words*) 获得海明威国际笔会奖。1999年以长篇小说《等待》(*Waiting*) 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以及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 并被译成20多种文字。2005年以长篇小说《战争垃圾》(*War Trash*, 2004) 再度获得福克纳小说奖。哈金是继菲利普·罗思和埃德加·怀德曼之后, 第三位两次获美国文学界最大规模奖项——“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的作家, 也是第一位同时获得此两项美国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哈

* 本文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青年基金项目“哈金小说研究”(项目编号: KX181052) 成果。

金在美国的成功，几乎是中国文学融入世界的“传奇故事”。无怪前两年华人夺取诺贝尔文学奖呼声高涨时，很多人都预测了哈金，因为一方面，他已经是英语世界中，书写中国故事的最重要的“美国作家”，此前，还没有一个华人作家在美国获得过如此地位；另一方面，就出身国家而言，他还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

从哈金自己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对这种说法颇为心许。他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伟大的中国小说》(2005)，光题目就显示出踌躇满志的姿态。虽然他谦虚地认为，“伟大的中国小说”尚未出现，但他认为“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同时指出，“依我看，‘伟大的中国小说’也就是在海外才可能出现！”[1]而他当初选择用英语写作，是为了使自己渐渐与记忆中的生活、母语的氛围拉开距离，同时也使他的思维获得解放，使他可以发现新的视角和更加客观纯粹地写作。哈金在接受采访时说：“英语让我感到自由”[2]。哈金自觉地从语言到思维的认同，大大地赢得了英语世界读者的信任，也方便了他们的接受。

哈金在谈到对小说的看法时，非常强调中国经验和真实性。他认为，“伟大的中国小说”，其关键在于是否反映了中国的经验，是否丰富了中国的文学。为此，他特别强调对细节的处理。在接受《书城》记者采访时，他说：“关键是有实质性的快感通过良好的语言表达出来，日常生活和细节使读者能看见和感到。”“他们所说的‘日常生活’是对小细节的描写和处理，是个技术性问题。很多作家不注意在细节上下功夫。细节描写不够，只给人概念上的东西。……西方小说特别讲究这个。纳博科夫说过：抚摸你神圣的细节。契诃夫在这方面有相当的理论，后来很多人受他影响。另外，汉语环境中对细节的选择不一样，读者的感受不同，所以评论界对我的细节处理印象深刻。”哈金据此对其他当代中国作家提出批评：“读作品时，觉得好像很新颖，但漏洞很多。美国一些好的出版社编辑，也提到他们写得粗糙等问题”[3]。

大多数对中国并没有多少了解的美国批评者和读者，会认为哈金为他们讲述了真实的中国故事。所以，美国图书界会有这样的评价：“哈金抓住了中国生活的特质，使我们对他的人物有了深切的了解，这个最陌生国度的‘与众不同’被浓缩成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人生戏剧，在纸上呼之欲出”[4]。而海外图书市场甚至会进一步发挥。在《战争垃圾》的推荐语中这样强调：哈金的“描述是未经过滤的、照相机式的，他所记录的景象由于其真实性而具有无穷的力量。”[5]

对哈金作品中的中国经验和真实性问题的讨论和质疑,国内只有零星文章。但哈金对当代中国作家的批评,指出的恰恰是他自己的问题。而细节的漏洞,从一个方面颠覆了哈金小说对现实反映的真实性。这里仅就哈金的代表作《等待》稍举数例加以说明:

《等待》中最为诟病的细节或许是,主人公孔林的乡下妻子淑玉还裹着小脚。在那个年龄层,这样的事虽然很难说绝对没有,但确实非常罕见,完全不具有代表性。但为了强调中国经验,小脚作为西方人熟悉的符号出现了。这部小说讲的是孔林要和淑玉离婚,事事逆来顺受的淑玉竟不松口,以致拖延了18年,到了政策规定的分居年限才离了婚。孔林和情人吴曼娜在漫长的等待后终于结婚了,两个人却感觉不到如愿和幸福。按照小说中的时间提示,孔林首次提出离婚正是文革开始的时候,这种时候敢提出和政治无关的离婚,几乎是天方夜谭,几无可能。而淑玉是个毫无主张言听计从的女人,她竟会在17年中对答应离婚绝不松口,成为离婚的最大障碍,除了作者需要她来支撑情节,实在没有充分的理由。作者应该知道,在文革期间,做逍遥派尚属不易[6:53],小说中还曾写到,孔林有一天在宿舍里睡不着觉,辗转反侧弄出些声响,都会遭到同宿舍人的喝斥[6:48];而这样一所部队医院竟熟视无睹一对出轨的情人天天一起散步厮守,实在不可思议。而吴曼娜在文革环境中对孔林的离婚要求理直气壮地表示支持:哪条理由比没有爱情更站得住脚?[6:71]简直不知道哪里来的底气。这样一位绯闻缠身的女性,在组织安排的为领导物色填房的政治相亲中竟然会被选上,也令人匪夷所思[6:116]。而乡间小报竟然会刊登孔林和淑玉离婚未遂的现场目击报道,简直令人啼笑皆非。在18年离婚等待以后,孔林和吴曼娜终于结婚。在80年代中期,结婚仪式中竟有向毛主席像鞠躬一项,中国读者无论如何都有时空颠倒的感觉。

而有些细节,明显是在向西方文化致敬。吴曼娜遇到的一位好心的老人,曾温情地把她唤作“天使”。这个词在中国的文革和前文革语境中出现,是很突兀的。而孔林珍爱的藏书之一,是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甚至那个和吴曼娜相亲的有点酸文假醋的军干部,也会拿惠特曼的诗装点门面,叫人不知作何感想。这种西方经验的嫁接,还有一处明显的破绽,不知作者有意还是无意:吴曼娜竟然在生孩子的当天就回了家。

在其他小说中,这种正中西方读者下怀的细节还有很多。在《幼儿园》[7]里,孩子们玩着宫廷游戏,而中国的读者恐怕也没听说过宫廷游戏怎样玩法。《新郎》[7]是一个男性同性恋故事,其中的男性主人公既会打毛

线又身怀高深武功。这些故事的“传奇色彩”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引起的意外和惊讶的程度或许不亚于西方读者。而这种让中国人也会感到陌生的传奇性，消解了所谓的中国经验和真实性。

二

哈金以英语写作，还希望以此达到他所说的“自由”的写作。这种写作是否真的就那样自由呢？哈金的小说几乎都是一些“暴露小说”，揭露西方人颇为好奇的中国文革前后的社会黑暗面。哈金试图通过表现公共生活对私人生活的侵占，来说明国家和个人的对立，以强调不合理的官方体制对人性的压抑。无论是《池塘》中基层领导的粗暴野蛮，《等待》中离婚规定的荒谬绝伦，《狂人》中大学官僚的飞扬跋扈[8]，还是《战争垃圾》中对立团体的勾心斗角，都是为了强调这一主题。甚至他的第一部以移民生活为主题的小说《自由生活》，也反复渲染对政治的厌倦[9]。

哈金笔下的小人物过着广场式的公共生活，几乎没有独立的个人生活空间。在《等待》中，孔林住在三人合住的宿舍里，连晚上在床上睡不着辗转反侧弄出些声响，也会遭到同屋的呵斥。他和吴曼娜做了十几年的情人，只能在大庭广众下散步，没有可以亲密相处的私密空间。孔林一直忌讳公之于众的老婆淑玉因为办离婚终于来到孔林工作的医院，她的小脚马上成为公共话题，她在理发室剪发短暂的逗留，她和孔林夫妻之间的私生活瞬间成为了公共生活。在《战争垃圾》中，俞元和他的战友更是过着完全没有隐私的公共生活，属于他的私人空间只有藏着女朋友照片的鞋底那么狭窄的一小块。在短篇小说《光天化日》[4]中，对穆英的游行示众，更是将个人隐私完全抖落在大庭广众之下。《狂人》中的杨教授在癫狂状态中的谵语，几乎是公共话语的化身，他对演讲的无意识执着，表现出公共生活对他强有力的控制。

哈金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知识分子”，或者说是读过书的有文化的人，但他们是一些缺乏行动能力的苍白贫血的窝囊废，他们的教养只是有助于审时度势以便保护自己，随时修正自己的行为，以免招来麻烦和杀身之祸。他们以好死不如赖活的心态在混日子。《等待》似乎在等待获得完整的私人生活，因为孔林和淑玉疏远的关系，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生活。但孔林似乎并不积极争取，几度准备放弃，最后终于完成了离婚结婚的程序，他还是很失望。因为他自己也不清楚要什么，等什么。在他完全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他仍然继续不明不白地等待。外在的压迫对他精

神生活的影响并不重要,他主要受困于自己的麻木不仁和精神贫弱。

《狂人》中的杨教授和叙事者万建也是这样的人。哈金的《狂人》写法上有点类似鲁迅的《狂人日记》,都是一个人在癫狂状态下的言语记录。但其间的差别一目了然。鲁迅的狂人狂得超拔脱俗,是一个具有拯救民族命运使命感的圣者形象。而杨教授平日里在学生心目中,是一个博学景行的谦谦君子,潜心学问,无意其他。但他在迷乱之际,显现出庐山真面目,一个器量狭窄、工于心计、粗俗下流、迷恋权力、耽于情欲的形象逐渐浮出水面。他只是为求名利不得而疯狂。《狂人》中的主人公即叙事者万建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正在积极准备博士入学考试,以便与未婚妻杨梅梅一起在北京生活。但副校长的儿子暗中同梅梅在交往。在副校长和英语系党总支书记的联合算计下,万建放弃了考试,丢掉了梅梅,最终走投无路。在这部小说中,虽然校长和书记都是一种政治权势的符号,但小说表现万建的失败,是通过表现他的无能和窝囊达到的,对权力的反思和批判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哈金笔下比男性更低一个层次的女性形象,更是一些面目模糊、言行缺乏逻辑的叙事道具和表意符号。哈金小说中的女性虽然很多,但大都缺乏独立的人格,她们的存在都服从于男人的故事。最典型的当然是《等待》中的淑玉和吴曼娜。她俩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完全为孔林而存在。她们的价值就在于营造出矛盾的两极,从而让孔林演绎出具有西方存在主义色彩的犹豫、选择与等待。这种由两个女人充当道具的功能在《自由生活》中得到重演。武男的妻子萍萍和初恋情人贝娜构成了武男内心冲突的两极。萍萍完全是淑玉的升级版,相夫教子、吃苦耐劳、持家有道,但全然没有个性,难以给读者留下任何印象。而贝娜在小说中几乎没有露面的机会。

在哈金的小说中,私人生活空间的贫乏,更多地不是公共生活的压迫,而是人物内心世界的缺失。他们是一些精神空洞、浑浑噩噩的人,既没有信仰,也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对《等待》中的孔林来说,离婚结婚其实是件无可无不可的事情。久拖不决的离婚固然有其外在的原因,但并没有强大到可以拖延那么久的程度,孔林似乎一直在寻找一个借口来延缓作出决定,因为对他来说,选择淑玉还是曼娜,并不是一个感情选择,因为他对感情没有信仰。这从他一结婚马上又后悔可以看出。在小说临近结尾时,他对自己感情上的无动于衷有一段表白:“他从来没有和一个他全心热恋的女人待上过一天——没有,在他生活中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女人,这种感情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6:285]。对《战争垃圾》中的俞元来说,回大陆还是回台湾也不是一个信仰上的选择,他既没有政治信仰,也没有归

属倾向。无非是因为老母亲和女朋友在大陆，他才坚决地选择回大陆；不然，去台湾也无所谓。就像孔林一结婚就后悔一样，俞元回大陆得知，母亲已经过世，女朋友已经嫁人，马上就后悔了，因为他过得不自在，不得意。他们的行为方式受到最简单的生存法则的支配，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因而，孔林等待结婚又在离婚上延宕，完全不具备哈姆雷特延宕的思想能力；俞元被强行卷入政治立场的甄别而不得不为回大陆盲目的拼争，也不具备堂吉诃德的理想情怀。他们只是一群思想麻木、行动僵化的木偶，通过他们，既无法传达灵魂的感动，也无法达到对不合理体制的反思和批判。

但哈金作品中并不都是些行为猥琐的知识分子，相反，哈金笔下有一群无知无畏的莽汉形象，他们非但不缺少行动，而且往往和作品中一些惊心动魄的场景联系在一起，比如《等待》中的强奸，《男子汉》中的轮奸，《战争垃圾》中的杀人等。这是一群浅薄粗鄙的愚莽汉子，他们冲动的行为带有强烈的猥亵的、血腥的、攻击性的肉体意味。与苍白贫血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有着低层特征和无法无天的行动能力。在充满肉欲、血腥、暴力种种局面失控的疯狂状态中，营造出一种类似巴赫金所谓的“狂欢”意味。所谓“狂”，在巴赫金看来即是“无所畏惧”[10:553]。这些行为的实施者是一些不循规蹈矩的人，他们不把官方规定的秩序放在眼里。巴赫金的狂欢意义，强调的是一种暂时的自由和平等的状态。在狂欢节上，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等级暂时被搁置。狂欢节往往上演加冕和脱冕的节目，把乞丐装扮成为国王，供人朝拜和羞辱。哈金的“狂”虽然毫无狂欢节欢愉轻松的气氛，但却暗示了国家机器的失控、体制的失范、社会的失序。这同哈金表现知识分子受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压抑，形成鲜明的对照。哈金的“莽汉”形象既非体制的化身，又非体制的反抗者，他们的狂欢状态不仅反衬出知识分子的精神羸弱，而且增加了小说的异国情调、传奇色彩，从而为作者在西方赢得人脉。

哈金在美国的畅销，是美国图书界把他的作品当作一种真实的社会反映而不是虚构作品加以推销的结果，哈金本人也无意拉开作品的虚构和现实的真相之间的距离。但哈金的作品其实经不起真实性的检验，因此我们不得不把哈金作品的内在逻辑，从社会生活的真实层面剥离开来单独讨论。这样，我们也就不必为哈金笔下的知识分子的压抑和莽汉的狂欢之间的矛盾性寻找理由了。哈金不考虑这中间的矛盾，因为这是他预先设下的靶的，他只是个枪手，朝着西方世界眼中“政治不正确”的体制开火就是了。在阅读哈金的小说时，我们始终能够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高处冷漠地观看着一群生物。这双眼睛中有的的是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带着轻视的怜

悯。这双眼睛就是哈金秉持的西方的视角，而被这双眼睛凝视的生物则往往就是中国人，这一点在哈金描写移民生活的小说《自由生活》中也不例外。对细节的推敲，并不能改变其选择性的视角。

三

哈金通过控诉某个体制的不好，目的是获得进入另一个体制的合法性和通行证。《战争垃圾》就充分演绎过这种通过对对立一方的血泪控诉和严词抨击，来表达自己的忠心，从而获得另一方的信任和接纳。哈金自己也注意到了这种“忠心”带有强烈的机会主义色彩，只是一种生存策略，并没有多少可信度。但实际上，哈金也在奉行这样一种生存策略。哈金屡屡直言不讳地声称，他的写作只是为了生存，并不顾及这和他的另一个写作目标——达到“伟大的中国小说”之间有什么冲突。

美国著名黑人学者盖茨在《种族的未来》中讲述了1960年代耶鲁大学的“纸袋晚会”，即门上挂一褐色纸袋，肤色深于袋者不得入内。他说：“我们坚信，这是一种应该即刻终止的文化遗产。但现在我们可以说，这种文化遗产被一种相反的检测所代替：意识形态上‘不够黑’的黑人则不受欢迎。我不太确定，这是否是一种进步”[11:18-19]。美国文学一贯拒绝承认少数族裔文学的存在，而随着20世纪后半叶多元化思潮的影响，在“平等权力法案”和大众“政治正确”意识的推动下，少数族裔文学同女性文学和同性恋文学一样，从边缘进入中心[12:1]。然而，虽然少数族裔文学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它却随着这种重视陷入另外一个困境：他们只能讲述自己民族的所谓“真实”故事。少数族裔作家要想真正获得主流文化的欢迎和褒扬，他只能充当一个信息提供者的角色，讲述自己种族的所谓“真实”故事，为白人主流文化的中心地位提供佐证。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只有标榜自己的种族身份，讲述自己种族的“真实”故事，才能在图书市场上立足。

哈金也需要在美国图书市场上分一杯羹，因此他也必须讲述“真实”的东方故事。然而西方眼中的东方本来就是被创造出来的。这里的“真实”绝不是符合客观情况的真实，而是符合西方对东方观念的真实。萨义德说：“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斯、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记忆、非凡的经历”[13:1]。因此，西方关心的并非东方的现实或命运，而是西方业已存在的对东方的表述。因此，讲述东方的故事，作者必须首先是一个美国人或者欧洲人，其次才是一个

个体。哈金很乖觉地给自己贴上了“美国人”的标签，并以此为出发点，对中国进行观照。

他的作品正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他以漠不关心的语气和居高临下的视角看待中国的事情。他从不喜欢自己笔下的人物，得势者往往迫害他人，自然毫无可取之处，而即使受害者，也往往乏善可陈。就是那些作为主人公的受害者，也很难激发读者的同情心。郜元宝说：“向别人转述哈金小说的故事情节是一桩省力的事” [14]。其实不仅如此，概括哈金小说人物也很省力，因为他们的个性不仅单一，而且永不发生变化。坏人永远都是彻头彻尾的坏人，主人公永远都是内心贫乏的窝囊废，女性人物永远都是面目模糊的表意符号。文学中的困境，往往是展现主人公精神的一种手段，如康拉德笔下浩瀚的大海，杰克·伦敦笔下茫茫的雪原，《日瓦格医生》中严酷的社会环境，都是为了把主人公放置在一个极端的环境中，让他经受考验，在逆境中展现生命的力度和人性的光辉。主人公即使死于这种困境，但总会有一种精神的、人性的胜利。哈金的主人公也处于种种困境当中，但他们并不能展现勇气、毅力、忍耐、友爱、互助、顿悟等美好的品德，相反，他们展现出的往往是优柔寡断、见风使舵、自私自利，乃至生命的猥琐和人性的卑劣。这与哈金心目中的“伟大的中国小说”恐怕还有相当的差距。

而哈金这样做，是为了适应向西方介绍来自中国的“真实”故事的需要。通过贬低中国来褒扬西方。哈金在 2007 年之前的小说中，只出现过一个理想的人物形象，这个人就是《战争垃圾》中的美国女军医格林大夫。她不仅医术精湛、恪守医道，而且长相俊雅、善良温和。就是这个来自敌对国的医生赢得了所有中国战俘的尊敬，大家都叫她“活菩萨”。我们不否认存在这样人物的可能性，但是，在《池塘》、《等待》、《狂人》、《战争垃圾》等几部长篇小说和《光天化日》等短篇小说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像样的中国人的形象。因此，对哈金塑造格林这样的理想形象，不由得人作如此推想。

这种怀疑在《自由生活》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公开表达对美国的热爱。哈金在《自由生活》中，通过选择性的强化、目的性的屏蔽，把美国塑造成人间乐土。他尽情赞美美国小孩的纯洁、美国大人的善良和美国景物的秀美，极少有所批评。近年来，政治话题、生态环境和文化冲突成为美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核心关注点，但哈金却无动于衷，他笔下的美国完全呈现出一种风平浪静的政治真空状态。与此相反，他着意揭露的却是中国的弊端和中国人的劣根性。小说中的中国人，包括武男的父母和叔叔在内，多是一些自私愚蠢的形象。哈金 1986 年离开中

国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似乎与冷战时期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差不多。在《自由生活》中,包括中国文化在内,几乎没有关于中国的正面内容。哈金的这部作品在意识形态上刻意迎合了美国的价值取向。就连《纽约时报》的报道开篇都用了这样的话:“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在令人沮丧的布什和布兰妮时代,尽管我们的军队还深陷巴格达无法抽身,尽管我们的媒体还是对财富地位着迷不已,但是一位成绩卓著、令人尊敬的美国作家却推出了一本严肃的爱国主义的小说。这部作品的标题就是《自由生活》,而这绝无嘲讽之意”[15]。他在《自由生活》中建立了一个乌托邦,通过对多种人生的否定,来肯定一种理想的人生。这是一个成功的美国梦,也可以看作哈金自己对一种理想体制的认同。

哈金在谈到大陆“官方作家”对他的偏见和歧视时,把自己放在边缘作家的位子。既有自谦,更带不服和不满。因为这不是他心目中的主流的文学评价体制。他是一个有着建构“伟大的中国小说”的理想的作家。但那不过是另一种文学评价体制的代名词而已,更世俗地说,就是美国图书界和文学批评界对中国文学的评价体制。

哈金的所有努力是进入这个体制,获得体制的接纳。他如履薄冰地接受图书界对他小说的反应,他对出版和得奖的期待让他在写作每部作品时感受巨大的压力。哈金承认,他最初的创作完全是为了生存,所以,什么可以出版写什么,是他写作的生存策略[16]。所以他的写作一直考虑的是如何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可。因此,随时调整自己,揣摩洋人口味,就成为他的日常功课。哈金一直强调自己在经营小说,用哈金自己的话说,写作是个技术活,而他是美国英语写作培训班里学出来的作家。哈金曾自我辩白:“我本身就是教英语小说写作的,可以说能够对技巧运用得很纯熟”[16]。他把这个工作更多地看作是一种工作,而不是心灵自然的流露、自我精神世界的历练、或对人生的感悟和思想的升华。也就是说,他只是美国文学体制下的一个忠实的工匠,而不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世界的思想者。他至多是一个传统的流浪水手,用一种耸人听闻的口气,把一些“传奇”的故事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当他把带来的故事说完的时候,就很难走得更远了。《自由生活》所受到的冷遇似乎在证实这一点。

参考文献:

- [1] 哈金. 伟大的中国小说[J]. 今天, 2005(1): 73—75.
- [2] 陈爱敏. 在他者语言中求生存:哈金访谈[J]. 外国文学研究, 2008(3):1-4.
- [3] 哈金访谈: 写作是种劳动[Z]. 2008.01.10. 2009年4月3日引自
<<http://jway.com.cn/jblog/favorites/2008/an-interview-with-hajin-in-chinese>>
- [4] 光天化日——乡村的故事[Z]. 2009年4月3日引自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ReadingTimes/ProductPage.aspx?gp=productdetail&cid=mca>>

- m(SellItems)&id=AA0061>
- [5] Book Review of *War Trash* by Ha Jin [J]. *Publishers Weekly*, 2004, (Vol. 251 Issue 31): 49.
- [6] 哈金.等待[Z]. 西藏: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2.
- [7] 哈金.新郎 [Z]. 西藏: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2.
- [8] Ha Jin. *The Crazyed* [Z].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2.
- [9] Ha Jin. *A Free Life* [Z].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7.
- [10] 巴赫金. 拉伯雷研究[A]. 巴赫金全集:第 6 卷[C].李兆林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11] Henry Louis Gates Jr. and Cornel West. *The Future of the Race*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6.
- [12] Zhu Gang. Preface [A]. Bernard W. Bell. *The Contemporary African American Novel*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 [13] 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14] 郜元宝. 谈哈金并致海外中国作家[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1): 70-74.
- [15] Walter Kirn. "Pleased to Be Here" [N]. *The New York Times*, 2007-11-25.
- [16] 李培. 哈金:我不会割掉与祖国的关联[N]. 南方日报, 2008-07-29 (B08).

新 书 架

丁超:《中罗文学关系史探》,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

这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考察和论述中国文学与罗马尼亚文学之间关系的专著, 通过原典实证等方法, 首次以跨文化和跨学科视野对中罗之间相互认知、两国文学互相接受的历程进行双向梳理和现代阐释, 展示中罗文学关系丰富多彩的全貌。全书分上下编, 时间跨度自 17 世纪下半叶至 2006 年。对此间有关作家与作品、译家与译著、版本与流传、翻译出版媒介及其他形式的文学和文化交流互动史实, 都做了考述评析。力求解释文学在沟通不同民族精神世界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探究文学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相互影响及其规律, 同时回应和纠正学界在对中罗文学与文化关系认识 and 评价方面某些已成定势的偏误。